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时间: 时序和时机

郝诗楠 唐世平

内容提要: 在定量方法兴起之后, 时间在社会科学中似乎已经被淡忘。当今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没有时间的”。批判性地建立在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时间中的政治”论述的基础上, 文章试图提出对时间(主要为时序和时机)在形塑特定社会结果方面的关键作用的更精细的理解。此外, 文章还以经典的“现代早期西方国家的崛起”为例提出一些基于时间维度的新理论假设, 并且以西方几个典型国家的发展经验来佐证了这些假设。

关键词: 时间 时序 时机 方法论 社会科学

中图分类号: C31/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947(2014)02-0194-12

长久以来, 社会科学的研究好像忘记了时间。比如, 在“行为主义革命”之后, 一些政治科学的文献所寻求的是“普适理论”抑或是“涵括性法则”(covering laws)。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种类似物理定律的研究结论是“超越时间背景”的——它既能用于解释古代的现象, 又能解释现代的现象。而在定量研究兴起之后, 社会科学的研究似乎更是变成了一种在大规模的个案(large N)中找寻普适因果解释的过程。这种过程意在通过统计技术(主要是控制变量)挖掘与某种特定“结果”所对应的单个或多个“原因”。这种研究虽然可以在纷繁复杂的资料中厘清并解释特定的社会现象, 但是它的最大问题依然在于缺乏“时间”维度。换言之, 这种研究假定每一个因素在时间维度上是无差异的。举例来说, 一般的回归模型可以表达为: $Y = a_1X_1 + a_2X_2 + \dots + a_nX_n + e$ 。其中, 在解释回归模型的时候, x_1, x_2, \dots, x_n 常被视作 Y 的“原因”^①; 在这种模型中, 每一个“原因”都同时对 Y 的变异起作用。它们出现的先后顺序或出现的特定时间点是微不足道的。

相反, 早期的一些定性研究, 尤其是传统的比较历史研究作品则非常注重时间的重要性, 它们往往能够梳理出时间维度上(主要是时序)的差异所导致的结果上的差异^②。只

作者简介: 郝诗楠,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感谢黄振乾同学的有益讨论。

基金项目: 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转型的初始状态、政治过程与转型制度绩效: 对全球转型国家经验和教训的考察”(项目编号: 2011SHKXZD011)。

① 一般来说, 回归模型中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概率性的相关关系。但我们在解释回归模型的时候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于将其视为某种形式的因果关系。

② 比如, 摩尔在其《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展示了不同国家农业商品化的不同时机所造成的不同后果。

是在定量研究的逻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确立了统治地位之后,这种原本对于时间的关注度不断地下降。因此,当今很多所谓的“历史”分析其实都是在非常“肤浅”地理解“历史”(Pierson 2004),有时甚至是在忽视“历史”。正如赵鼎新(2011)指出的那样:忽视时间是一些运用了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作品所共同存在的缺憾。

我们认为,不论是考察政治还是经济都需要了解它们特定的时间情境。而本文的主要目的也正是要在方法论的意义上重新唤醒“时间意识”:即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要引入时间的维度。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指出,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应该关注导致特定结果的原因(cause of the effect),而且还要关注原因在时间维度上的组合与特定结果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首先根据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有关“时间”的阐述,分析了“皮尔逊命题”的内容与意义;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以经典的“现代早期西方国家的崛起”为例,提出一个基于时间维度的理论假设,并选取了西方几个典型国家的发展之路来对我们前述的假设进行佐证。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与讨论。

一、“皮尔逊命题”的含义与意义

早在1998年,政治学家保罗·皮尔逊就在美国政治科学会年会上提交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我们不能仅关注“是什么(what)”,而且还需关注“什么时候(when)”(Pierson, 1998)。而在2004年出版的名为《时间中的政治》(Politics in Time)一书中,皮尔逊进一步将“时间”进行了具体化(Pierson 2004: 16)。在皮尔逊的眼中,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仅仅是“快照”(snapshot)而不是“影像”(moving pictures);而很多所谓的“历史研究”也不过是虚假的。真正的历史研究应该从“理论上”来关注时间,因为“真实的社会过程都有其特殊的时间维度”(Pierson 2004: 5)。《时间中的政治》所给出的有关时间的概念有许多,比如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顺序(sequencing)、事件(events)、持续时长(duration)、时机(timing)以及非意图后果(unintended outcomes)等(Pierson 2004: 5~6)。但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后文所要着重考察的便是时序(temporal sequence)与时机。

那么,时间究竟有多重要?皮尔逊正确地指出:如果两个事件或特定过程在某个历史时期同时发生与错时发生,其造成的结果一定有所不同。简言之,这里的“错时”就是所谓的时序问题(Pierson 2004)。它所涉及到的是厘清几件事情以“何种次序”(in what order)发生。加拉格尔(2002)的一篇比较中国与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研究可被视作一篇有关时序的出色探索。该文章指出:正是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私有化(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及民营企业的建立)的时序不同,使得中国没有像俄国和东欧国家那样在政治失控及自由化的压力下进行经济改革。

而“同时”则可能更多与时机相关。时机主要讲的是“何时发生”或者是时间点的问题。最简单的时机问题就是看某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点上。比如:拥有某种技术的时间是在中世纪或是现代时期?更为复杂一点的时机问题是:某件事情发生是否适时?是发生在某个“节骨眼”(conjuncture)上还是发生在无足轻重的关头?可以想象,在16世纪拥有枪炮肯定比在19世纪拥有要更有意义,而假如说西方征服者在发现美洲土地之时已

经拥有了良好的抗病毒技术,那么之后的世界历史就很可能大不一样了。关于时序和时机,后文还将对其做更详细的展开,下面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皮尔逊命题”的意义。

我们可以从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来评估皮尔逊的上述论点的意义。首先,从理论上来说,它不仅超越了“基于变量(或因素)的解释”途径,而且在方法论方面能够成为定性研究复兴的一个抓手。在行为主义革命之前,许多经典研究还是注意到了事件或社会过程的时序背景(Verba,1971),比如前面提到的摩尔。但是,“科学化”与计量分析的引入却把时间变得十分表面化和边缘化。尽管一些基于量化的分析时常引入“时间序列”(time series)和“滞后变量”(lagged variables)来增加其“动态性”。但究其本源,量化的多元因果分析一般是基于“偏回归”或“偏相关”的^①。这种分析并不细究自变量之间的时间顺序组合,而时间背景(时机)则索性被完全的抽离。换言之,正如导论中所提到的那样,多元回归模型几乎都属于“共时性分析”或“静态分析”。此外,基于变量(或因素)的解释还是一种“黑箱”(Black-box)式的解释:它能够告诉我们变量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但它并没有将变量之间的“联系机制(linking mechanism)”揭露出来。换言之,“黑箱”解释可以提供诸如“A导致了B”这样的知识,但无法告诉我们“A如何导致了B”。因此,有许多学者提倡要不满足于现有的解释限度,要善于“打开黑箱”找寻“机制”(Hedstrom,2005)。而寻求“基于时间的解释”也是“寻找机制”努力的一部分。从本体论上来说,时间与机制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因果链条一般都是在时间维度上展开的。

其次,从实际上来说,注重“时间”维度可以让实践者们重新思考一个经典的问题:我们能否采用“总体方案”来同时完成多重任务?一般来说,这种“总体方案”是忽略时序的。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时间紧迫”,因此都希望能相对短的时间内做相对多的事。比如在当今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何建设民主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能不能同时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主的转型?国家建设、法治与民主之间的实现顺序究竟应该如何排列(Collier,2010)。此外,注重“时间”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先发”与“后发”之间的关系。先发者在无规则的“丛林”中横行,取得了收益之后,会设定一系列的“标准”与“地盘”,对后来者进行限制。而对于后来者来说,这些“标准”或“规则”缩小了它们可能的行动范围。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讨论“后发者优势”。但是,我们仍不十分清楚“后发者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且应该参照过去”或“在何种意义上学习别人的‘经验’”。实际上,先发者与后发者的最大差别在于发展的“时机”不同,因此在某一特定时间针对某一个国家的解决之道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时间点上的其他国家(杜甘,2010:65)。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许多后发国家的领袖热衷于抨击或照搬过去先发国家的经验也算是一种“时间上的错置”。

但是,“皮尔逊命题”有一个致命的不足之处:那就是,尽管他提出了诸多时间要素的重要性,可是他的论证却基本上是逻辑的甚至是抽象的。皮尔逊并没有为我们展示时间在经验上(empirical)的重要性,也没有向我们展示在引入时间之前与之后,会产生何种不

^① 也就是说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到因变量的自变量之后,若余下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回归系数为显著,那么就确证二者之间为因果关系。

同。而我们认为,只有经历了经验上的验证,我们才能够确证一个命题或者理论假设。本文将在下一节中“补做”这一皮尔逊漏做的“功课”。

二、时间的重要性: 以对现代早期西方诸国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为例

从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一旦引入了时间维度,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变量-变量”为核心的静态研究可能会发生变化。相同的自变量在不同时间维度(如时序或时机)上组合可能导致不同的后果(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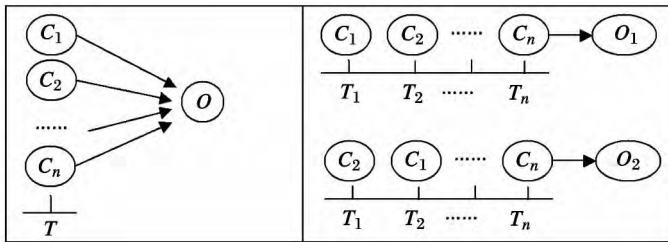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变量-变量的静态解释与引入时间的动态解释

图1的左半部分所展示的是一种静态的“变量-变量”解释路径。在这种路径中,时间因素未被考虑进去。所有对于“结果”(O)的“原因”(C₁ C₂...C_n)都被置于同一时间点上。而图1的右半部分所展示的则是一种引入时间因素的动态解释。在这种解释路径中,诸“原因”被分别置于特定的时间点上。其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导致两种不同结果(O₁、O₂)出现的情形中,C₁与C₂两个因素在时间上的组合顺序是不同的。在第一种情形中,C₁先于C₂出现;在第二种情形中,两者的出现时序则正好相反。可正是解释因素在时序上的这一差异,导致了最终结果的差异。

从本节开始,我们将结合具体的例证进一步展示时间在历史事件发展中的“力量”。我们选取的佐证(illustration)是“现代早期西方诸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经典议题,有许多学者对其提出了有力的解释。当然,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对此做深入的案例分析,而是在于借此来说明时间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在此使用的是“佐证”而不是“案例研究”这个词。

许多过往的研究都告诉我们西方国家为什么能发展,却没有很好的回答“为什么有的国家不如另一些国家兴盛或发展得好?”而下文将指出,这个“差异性”(variation)的问题可以通过赋予“制度”与“技术”以时间维度得到解释。首先,我们将会设定一个基轴(baseline)。其目的在于辨识出导致某一特定结果的原因,也就是先建立一个没有时间维度的静态解释。这一解释的核心论点是:在时间与时序恒定的情况下,制度与技术的差异决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随后,我们会将时间的维度引入上述的“基轴”解释。而设定此“时间轴”的目的在于比较若干原因或因素在时间维度上的不同组合所导致的不同后果。在引入时间维度后,我们将看到:制度与技术之间在时序上的不同组合以及获得制度或技术的时机,导致现代早期西方诸国在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国家兴衰方面的差异。

(一) 基轴: 制度与技术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

1. 制度。许多经济学家尤其“新制度主义者”把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引入经济分

析之中。但是,他们倾向强调“产权保护”以及“自由制度”的功用。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中,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被归结为“自由的制度”或“多元化的思想”(Goldstone 2009)。换言之,这种“制度主义”的解释途径选择性地忽视了商人与商业活动对于国家——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中央集权国家——的依赖。诺斯与托马斯曾谈到中央集权对英国兴起的推动(诺斯、托马斯 2009:218);但从整体来看,他们所着重强调的仍是商人的力量或“自由的制度”。

本文认为,忽略中央集权国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过分地强调“自由”、“产权”与“商人的力量”无疑是本末倒置的。从实际的政治发展过程来看,一切权利的实施都需要费用,而这个费用一般是支付给能够界定与执行这些权利的公共权力的。例如,很多人认为产权是对于主权的限制,但是这只是前者实施之后的结果;而产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只能是统一且有效的公共权力(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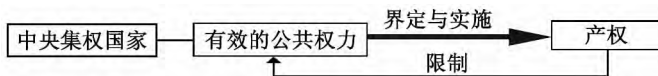


图2: 中央集权制国家、公共权力与产权的关系

“现代国家”(modern state)或曰“民族国家”是相对于城邦(主权分裂的政体)与帝国的概念(Tilly,1992)。它的核心是中央集权制政体,其最大的特点是存在一个凌驾于地方之上的统一权威。中央集权是一个制度集——其中至少包括了统一的财政(税收)与司法这两个子制度(斯特雷耶 2011)。

相对于帝国和城邦,中央集权制政体拥有着“比较优势”。首先,相较于帝国,中央集权政体在政治上强调“实力之治”。它所关注的是“有效统治”也就是对于每一寸领土的真实“治理”而不是帝国式的“礼治”。因此,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公共权力在其治下的领土上实现了“全覆盖”。

其次,从军事方面来看,只有中央集权政体才能够维持一支全国性的常备军^①。常备军的出现扩展了国家提供有效保护的覆盖范围——这是市场发展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而这也使得更大规模商业与贸易发展成为可能。奥菲尔的研究指出:英帝国在海军上每支出3英镑,就可以相应地通过海外殖民或贸易获得100英镑的收入(Offer,1993)。

再次,在经济上,中央集权国家统一了税制并由国家官僚直接征税。一方面,它降低了征税成本(Kiser et al.,1994),有效地扩大财源并最终增加了岁入与财富的积累。这为国家有效的执行其意志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通过财政与司法权力向社会各个角落延伸,中央集权制国家因而拥有了与帝国和城市国家相比更为有效的执行力、协调能力与低廉的交易成本。这些保证了契约的履行及大型市场活动(规模经济)的效率。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恰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才是市场交易、贸易甚至是创新的激励因素。试想在某一领土上如果没有有效的执行,发明与专利的保护将如何实现。爱

^① 通过引入征兵制(conscription),中央集权国家扩大了兵源,并通过专业化提升了常备军的质量。关于西方常备军的发展详细可参见拉克曼的研究(Lachman 2011)。

珀斯坦正确地指出: 中世纪晚期危机的本质在于“多重协调失败的司法管辖权的支离破碎, 而不是统治者的独裁专制”(Epstein 2000)。

2. 技术(知识)。长久以来, 地理因素(包括资源占有状况)被视作可以决定经济发展程度的初始禀赋而被纳入对增长的分析中。但是地理条件本身并无法创造出优势, 必然是通过某种中介物来创造。学者们也广泛意识到: 不论对前现代国家还是现代国家、后发或者先发国家, 即便存在着资源、区位优势, 也不足以保证这种优势得到发挥(张宇燕等 2004; Acemoglu et al. 2002; North et al. 2000)。换言之, 地理因素只是一种“潜力”(Potential), 它需要其他因素来将其“显化”。而显化的关键则在于“技术”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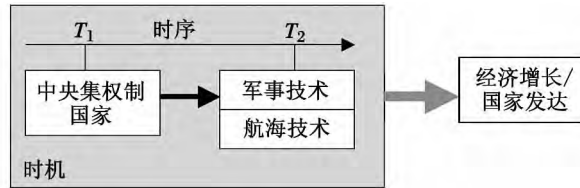
对现代早期的欧洲人来说, 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如何走得更远”这一问题。因为一方面, 欧洲有许多商人需要进行远距离贸易; 另一方面, 欧洲的人口在 16 世纪的重新增长使得民众与统治者亟需舒缓其带来的压力^①——最佳的方法就是发现新的土地进行拓殖。因此, 有关交通与军事方面的知识或技术就显得日益重要。在现代早期, “交通技术”主要指的是船舶以及导航技术; 而“军事技术”则主要指的是武器的制造与装备。这两种技术可以互相转化, 比如军事技术某些情况下是各种民用技术(包括交通技术)创新的源泉(诺斯、托马斯 2009; White 2005)。从历史上看, 西欧各国在技术进步的的庇荫下, 一方面通过探险活动开疆辟土, 缓解了“马尔萨斯困境”并获得了许多额外的收益与资源; 另一方面则保证了远距离贸易(Braudel, 1992; Acemoglu et al. 2005)的顺利进行。其中, 航海技术尤其是导航技术的进步使得商人们可以走得更远, 而军事技术的进步则降低了护航的成本, 并通过有效打击海盗保证了商船在海上的安全。

(二) 引入时间: 制度与技术何时得到以及以何种时序得到?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制度与技术促进经济发展”这样的论调仍旧属于一种静态的解释。我们虽然明白中央集权制与航海与军事技术对于早期西方国家兴起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这并不足够。因为仅仅知道有哪些“原因”并不能很好的解释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例如, 意大利在很早的时候便拥有了先进的军事和航海技术, 也最终实现了统一的中央集权, 可是为什么却在其他国家崛起的时候被甩到了后面? 因此, 对于这类问题的解释, 我们不仅要关注“因”, 而且还需要将两者“置于时间之中”, 换言之, 我们还需给出有关制度与技术这两个因素在时间维度上位置的理论假设(见图 3)。

1. 时序。正如前文引述的有关中国与苏东国家改革顺序的比较研究那样, 我们也认为获得中央集权制与两种技术的时序组合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具体来说, 某国在发展两种技术之时, 若已经实现了中央集权制, 那么该国就会获致经济的发展或国力的增强。相反, 若在没有中央集权制的情况下发展上述两种技术, 就很有可能获得失败甚至是国家的衰弱。换言之, 若要获得国家的崛起, 那就必须在发展技术之前先实现中央集权。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技术是通过效仿而获得的, 因为这是一条成本最低的路径(Resende - Santos, 2007)。而国家学习技术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效能。左希迎(2010)对普鲁士

^① 根据 M. K·贝内特的估计, 西欧的人口自 1300 年开始急剧下降一直到 1400 年(下降了约 2000 万人); 而人口从 1450 年开始增长, 到了 1550 年, 人口已经超过了 1300 年的水平。——转引自诺斯、托马斯(2009: 106)。



注: (1) T_1 、 T_2 表示时间上的先后顺序; (2) 灰色的置底方块表示特定的时机。

图 3: 关于西方现代早期经济发展的动态解释

与奥斯曼帝国“军事(技术)效仿”的比较研究指出普鲁士之所以能够通过效仿别国的军事技术获得国力的增强是由于其国家能力相较于奥斯曼帝国要强大。尽管,左希迎没有明确地提到“中央集权”,但是他也通过“精英凝聚力”以及“制度规范与汲取能力”这样的概念暗示了中央集权制是技术发展的“关键前因”(critical antecedents)。

正如皮尔逊所言,时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先发生的事件或过程会触发“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或“自我强化”(self-enforcing)机制因而决定之后的历史进程(Pierson, 2004: 65~71)。因此,“谁在先、谁在后”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相似地,我们之所以强调中央集权在先,技术发展在后也是因为其中暗含了某种机制性的关系。首先,进入现代之后,战争的特点转变为大规模、长距离且长时间。而这样的战争不仅仅需要人力,而且更需要一定的技术——尤其是航海技术(实现远距离兵员投送)和军事技术(有效且大范围地摧毁敌方设施,实现完全的占领)。此外,对远距离贸易提供保护也“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领主力所能及的”(诺斯、托马斯 2009: 95);换言之,即便拥有良好的航海技术,但只要没有中央集权,那么国家军事技术就会十分羸弱;所以,若此时实施护航,要么成本非常高,要么效率非常低。

其次,从本体论上来说,技术是一种知识。它需要去被创造、发现或者是效仿(学习)。我们究竟需要何种知识?我们该如何取得这种知识?这些都需要人为地(通过制度)来进行决定。中央集权制与没有实现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对知识的偏好也有所不同,因为两者为了技术进步所能够支付“费用”的能力是不同的。正如保罗·肯尼迪(1989)所言,财富“永远是军事力量的基础”;某些技术发展的代价只有中央集权国家才能担负得起。

总而言之,某些技术对于非中央集权国家来说要么用不着(如城市国家不需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要么就是无力发展(如封建性帝国各自为政使得技术创新难以进行);还有一种情况则是在发展或应用某种技术的时候遭遇了合作或协调的困境——尤其是对于大型船舶和武器的研发与制造来说,都需要大规模的动用劳动力并对其进行有效的协调;因此,在实现中央集权之前就发展技术,很有可能会受到贵族与地方势力的掣肘,最终会使得该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受到限制,导致“技术流失”。

2. 时机。尽管皮尔逊(2004)在其著作中提到了“时机”,但是他并没有对其作进一步的阐释;相反,他把关注焦点一直放在“时序”上。然而,“时机”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尤其对于历史(或历史社会学)研究来说。前文有提到,所谓对“时机”进行研究就

是找出某个“节骨眼”的过程。而厄特曼说,“时机”则与知识积累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时机”所反映的是某种“时代特点”,在考察某种事件或因素的时候,对当时的“背景(context)”进行考察非常重要(Ertman, 1997)。

如果说“时序”是系统内(within-system)的“时机”,那么“时机”则是系统层面(systemic)的“时序”。因此,我们有时也会用“先”与“后”这样的词汇来描述时机,而我们若将某一时序拆解后再看,那么我们可以辨认出其中每一个因素、事件或过程在该时序中的“时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时序和时机是无法截然分开的。

在本文中,“时机”所指的就是一个国家在何时拥有何种东西:在某个紧要关头或“节骨眼”上是否拥有某种技术或制度会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举例来说,在人口与土地矛盾凸显的时候是否有航海技术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某国此时拥有了航海与军事技术,便可以将人口疏导到海外以使该国不至于陷入“马尔萨斯陷阱”,甚至能够以此为契机扩大市场与贸易规模获得额外的收益;相反,此时若无法实现将人口疏导,最有可能的结果便是瘟疫、饥荒或战争,进而便是国力的下降。另一方面,若在各均广泛地拥有了航海技术时再去学习或发展该技术,其作用就会受到削弱。因为技术与制度的重要性是随着时间而发生改变的,在大家都拥有了某种东西的时候就没有了比较优势。

另外,我们必须承认,某种因素甚至某个时序组合的有效性也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比如,本文所提出的有关时序的假设很有可能只适用于现代早期的西方国家,如果把它盲目照搬到数百年后的西方甚至是东方,它也许就会失去解释力。换言之,某个有关时间的命题若要成立,那么它必须同时满足时序与时机方面的要求。

(三) 佐证时间假设

接下来,我们将用若干事例材料来验证上面提出的理论假设。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变量,我们对研究单位的选择遵循“最相似系统设计”(most similar system design)的原则(Przeworski et al., 1970)。换言之,我们仅在西方世界来寻找可用的例证。下文主要用意大利与西班牙做对比,间或论及法国、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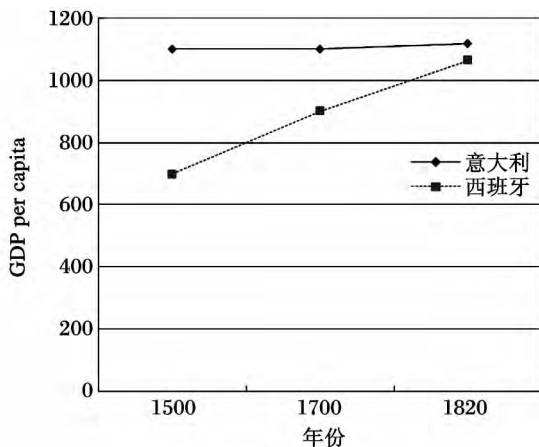
1. 时序的重要性。在中世纪时,意大利的城市国家是欧洲商业与贸易的核心。威尼斯等城市还被视为欧洲与东方之间的桥梁(Maddison, 2007)。意大利的商人不仅创造了许多新的商业技术,而且还四处放贷,甚至一度成为欧洲某些君主的“债主”。但是,意大利自从1500年之后就开始逐渐衰退。在1500~1800年之间,意大利的人均GDP增长是停滞的(Maddison, 2007)。对这一“明星”陨落的通常解释是:大西洋贸易的兴起取代了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地中海贸易(Acemoglu et al., 2005)。然而,这样的“零和”解释忽视了意大利自身的问题:意大利并没有遵循中央集权-技术发展这一时间顺序,而是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意大利在中世纪时就是航海技术的领先者,威尼斯不仅拥有当时最大的阿森纳造船厂,而且还产生了出色的导航技术(主要是指南针和航海图的应用)。但是,意大利直至19世纪才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此前,意大利一直都是由“城邦”所组成的,甚至有人认为在19世纪之前,意大利“都不过是个地理词汇”(帕特南, 2006: 141)。许多学者倾向于将意大利的“城邦”视为“自由”的典范。但我们认为,与其说它是一种“自由”的状态,不如说是一种主权分裂的状况:正是因为亚平宁半岛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来协

调商业活动、贸易与技术创新,才使得意大利没有赶上西方发展的“列车”。

而意大利的航海技术自然“流失”到了先实现了中央集权的西班牙。西班牙通过支持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的探险从而“获得”了航海技术,并且在强大军事力量^①的“加持”下,获得了国力的增强。

西班牙早在1479年就实现了国王相对于地方政治势力的中央集权。在许多论者看来,西班牙是一个“专制国家”。但正是这样的国家才有能力和意愿“接收”从意大利“流失”过来的技术。西班牙由于实现了主权的统一,不仅有财力“购买(悬赏)”航海技术,而且也有能力发展出强大的军事力量。正是这种时序上的组合使得西班牙(相对于意大利)成为了西方率先将触角伸到美洲的国家。结果,美洲的白银大量“西进”,其不仅恩泽了西班牙本身,而且还惠及了整个欧洲(张宇燕等,2004)。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时期的统计数据。在1500~1820年,意大利的人均GDP增长率为0.21%,为西欧最低,同期西班牙的增长率为0.31%;而到了19世纪,原本人均GDP约为意大利一半的西班牙已经与前者达到了相似的水平(见图4)。虽然之后西班牙在英国与荷兰兴起的背景下衰落,但是它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部因素——如“英西战争”的失败以及美洲白银供给量的下降——的影响。



来源: Maddison(2007: Appendix A and B)

注: 人均GDP的单位为“1990国际元”

图4: 西班牙与意大利的人均GDP: 1500~1820年

除了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外,我们还可以给出一些类似的例证:法国也是先实现中央集权再进行技术发展(主要是军事方面的火炮技术)的国家,因此也经历了人均GDP的增长;而与之相反,奥斯曼帝国在效仿技术的同时却维持了帝国而不是发展现代中央集权国家,所以这一发展进程由于受到国内势力的抵制,最终半途而废。

2. 时机的重要性。除了时序之外,我们还可以用“时机”来解释前述的西方内部的差

^① 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国家根本无法实现常备军的保有和武器技术——尤其是船载火炮。

异。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兴起与扩散外加有效的海上探险与拓殖创造了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使得像意大利城邦一样的地区性市场迅速被伦敦这样背后有着强大国家力量支持的大都市取代。这里就有一个“何时拥有何种制度和技术”的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 意大利与奥斯曼帝国都没有抓住时机发展应有的制度, 而是妄图用既有的技术(意大利)或直接引入国外技术(奥斯曼帝国)来参与竞争, 结果必然是一败涂地。

另一方面, 没有抓住时机的危险在于: 早发者一般战略选择的“自由度”较大, 而迟来者相应的就有了一个“被压制”的问题。我们可以构建这样的一个反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s): 如果意大利在11世纪(或18世纪)——而不是19世纪——便实现了中央集权, 那么或许如今意大利也能够赶上西方的其他“发达”国家, 甚至有可能趁西班牙衰落之际取代它的位置。

三、结论与讨论

以上的论述提出了一个有关时间的初步理论假设: 不同因素、过程或事件在什么时间以及以何种时序发生, 都会对最终的结果造成影响。因此, 当我们在解释某种结果为何出现时, 不能仅将可能的原因罗列出来, 因为这种“黑箱”或静态的解释无法为我们提供关于历史过程的完整知识。

而本文对于上述理论假设的佐证则是基于对“现代早期西方诸国的经济发展的差异”这一案例的检视, 这一佐证为我们展示了时间的重要性。首先, 我们承认中央集权制(制度)和(航海与军事)技术决定着西方诸国早期发展的程度。但是这一命题并不足以完全解释西方诸国发展程度的差异, 我们因此需要借助时间维度来形成更加动态的命题: 其一, 有关时序的命题是: 若中央集权先于军事与航海技术而实现, 那么国家便会富强, 而若将上述时序弄反, 则无法给国家带来发展; 其二, 有关时机的命题是: 即便符合前述的时序要求, 还需要符合“时代背景”。

当然, 本文只是在理论上强调了时间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意义上的重要性。尽管上文也有一定的佐证部分, 但是该部分的目的仅仅在于展示不同因素在时序和时机方面组合所导致的结果差异。换言之,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进行完整的经验或案例研究。此外, 本文所关注的仅仅是“时间”维度的两个主要方面。正如皮尔逊在其著作中所提到的那样, “时间”不仅仅意味着时序和时机, 还包括了其他各种因素。比如, “初始时间点”的不同也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因此, 我们认为未来值得进一步推进的工作主要有: 一是将时间维度引入经验或比较历史研究中, 或用更为丰富的经验材料对时间因素的重要性做进一步的验证; 二是对时序和时机以外的“时间”因素做出更多的探索。

参考文献:

彼得·穆迪 2004 “东亚: 自上而下的民主”, 载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 2009 《西方世界的兴起》, 北京: 华夏出版社。

贾雷德·戴蒙德 2006 《枪炮、病菌与钢铁: 人类社会的命运》,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卡尔·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一卷)》,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 罗伯特·帕特南,2006《让民主运转起来》,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马太·杜甘,2010《国家的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马亚尔,2004《世界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沃尔特·白芝浩,2008《物理与政治:或“自然选择”与“遗传”原理应用与政治社会之思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约瑟夫·R.斯特雷耶,2011《现代国家的起源》,上海:格致出版社。
- 张宇燕、高程,2004“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社会科学战线》,2004,1。
- 赵鼎新,2011《东周战争与儒家国家的形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左希迎,2010“新精英集团、制度能力与国家的军事效仿行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9。
- 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 A. Robinson, 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 1231–1294.
- , 2005.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3): 546–579.
- Bates, R. H., A. Greif, M. Levi, Jean-Laurent Rosenthal, and B. R. Weingast, 1998. *Analytic Narrativ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raudel, F., 1992.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 2): The Wheels of Commerce*. Berkeley and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1992.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 3):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Berkeley and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llier, P., 2010. *Wars, Guns and Votes: Democracy in Dangerous Places*. London: Harper Perennial.
- Epstein, S. R., 2000. *Freedom and Growth: the Rise of States and Markets in Europe, 1300–1750*. London: Routledge.
- Ertman, T., 1997. *Birth of The Leviathan: 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llagher, M. E., 2002. “Reform and Openness: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Have Delayed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54(3): 338–72.
-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Y: Basic Books.
- Goldstone, J., 2009. *Why Europe?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1500–1850*. NY: McGraw–Hill.
- Hedstrom, P., 2005. *Dissecting the Social: On the Principles of Analyt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 P., and J. M. Nelson, 1976.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iser, E., and J. Schneider, 1994. “Bureaucracy and Efficiency: An Analysis of Taxation in Early Modern Prussi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2): 187–204.
- Krasner, S., 2004. “Globalization, Power and Authority”, in E. D. Mansfield, D. Edward, and R. Sisson eds.,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Knowledge: Democracy, Autonomy and Conflict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Kuenne, R. E., 1963. *The Theory of General Economic Equilibrium*.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chman, R., 2011. “Mercenary, Citizen, Victim: The Rise and Fall of Conscription in the Wes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Lijphart A. ,1971.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3) : 682 – 693.

Maddison A. 2007. *The World Economy(Volume2) : 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 OECD.

Mahoney J. ,and D. Rueschemeyer ,2003.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nn M.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1) :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rth D. C. ,W. Summerhill and B. R. Weingast 2000. "Order ,Disorder and Economic Change: Latin America vs. North America. "in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Hilton Root ,eds. ,*Governing for Prosperity*.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North D. C. ,and B. R. Weingast ,1989.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 – Century England. "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4) : 803 – 832.

Offer A. ,1993. "The British Empire ,1870 – 1914: A Waste of Mone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6 (2) : 215 – 38.

Pierson P. ,2004.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Not Just What but When: Issues of Timing and Sequenc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rzeworski A. and H. Teune ,1970.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Y: Wiley – Interscience.

Resende – Santos J. 2007. *Neorealism States and the Modern Mass Ar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illy C. ,1992.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 – 1992*. Oxford: Blackwell.

Verba S. ,1971. "Sequences and Development. "in L. Binder et al. eds. *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hite M. 2005. *The Fruits of War: How Military Conflict Accelerates Technology*. NY: Simon & Schuster.

Time in Social Sciences: Temporal Sequencing and Timing

Hao Shinan & Tang Ship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Abstract: After the quantitative approach achieved prominenc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ime seems to have largely disappeared from them. Most social science studies today are timeless. Critically building upon Pierson's *Politics in Time* , we seek to provide a more fine – grained understanding of the critical role of time – most prominently ,temporal sequencing and timing – in shaping social outcomes. We illustrate our arguments by developing several new time – centered hypotheses regarding the classical question of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Europe. "

Key words: Time; Temporal Sequence; Timing; Methodology; Social Science

(责任编辑: 丁开杰)